

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特点与趋势

丁俊玲, 陈佳甜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上海 200433

DOI:10.61369/EIR.2026030022

摘要：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全球布局持续拓展，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已成为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议题。其动因体现为学习者需求与教材适配性的双重驱动，开发对象覆盖欧洲、亚洲、非洲、澳洲等多个地区及多种教材类型，开发维度则从语言要素的本土化调整迈向深层文化融合。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三种转向：从单向传播中国文化转向双向交流互鉴，从静态教材转向动态生成的数字化教学资源，从语言文化输出转向“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整体而言，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正从被动应对教材适配性问题，转向主动构建更具适切性、生成性与价值导向的教学资源体系，推动中文教育从“语言传播”向“价值创造”转型升级。

关键词： 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特点；趋势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Secondary Development of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Ding Junling, Chen Jiati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As the global presenc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secondary development of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textbooks has become a key focus in bo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learner needs and textbook adaptability, encompassing diverse regions such as Europe, Asia, Africa, and Australia, and covering various types of textbooks. The scope of development has evolved from localized adjustments of linguistic elements toward deeper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trends, three major shifts are evident: a shift from one-way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two-way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 shift from static textbooks to dynamically generated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and a shift from the export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through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Overall, the secondary development of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textbooks is moving from a passive response to textbook adaptability issues toward the proactiv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context-sensitive, generative, and value-oriented teaching resource system, thereby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o “value creation.”

Keywords：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textbooks; secondary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trends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拓展，截至2025年底，中文教育已覆盖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学习和使用者累计超2亿人，中文被90个国家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甚至被列为高中会考或大学入学考试的外语选考科目，中文的国际影响力与战略价值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在国际中文教育国别化教学中，教材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资源与载体，其国别化实践一直是研究的重点。由于各国在文化背景、教学情境、学习者特征及学习需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随着中文需求的持续扩大，通用型教材已难以契合本土化教学实际。因此，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以适配多元化的教学场景，显得日益迫切。

所谓教材二次开发，是指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具体教学情境和学生需求，对教材内容进行创造性调整、补充、删减、重组或改编，以实现教材与教学实际的最佳适配，从而将“普适性”教材转化为“情境化”教学资源的过程^[1]。随着中文教育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拓展，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实践日益丰富，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与多元的发展趋势。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2025年度本科重点教改项目“AI赋能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教学探索”（编号：2025120187）。

作者简介：

丁俊玲（1971—），女，汉族，河南郑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跨文化商务交际。

陈佳甜（2001—），女，汉族，湖北武汉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

一、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的主要特点

（一）开发动因：学习者需求与教材适配性的双重驱动

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的根本动因在于通用教材与特定教学情境之间的适配性问题。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全球共有164个国家和地区建有510所孔子学院。而中文教材的研发和建设相对滞后，大多数孔子学院使用的教材主要来自教育部语合中心的赠书，且以中国国内编撰的中文教材为主^[9]，教材内容与当地文化、语言环境脱节，与学生需求错位。

中文教材本土化是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国际中文教育品牌辨识度的有效途径^[9]，此已是学界形成的共识。然而直接编写国别化教材面临研发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数量偏少等现实制约。此类教材虽能立足特定国家学习者的实际需求，适配当地教学情境，兼具针对性与实用性，本土化程度较高，但相较于从零编写，教材二次开发的策略更为务实可行，即在现有教材基础上进行本地化改造，从而降低开发难度、缩短周期，并有效回应国别化需求。

教材二次开发的目的是使教材的普适性转变为符合教学实际的独特性，这一转变也体现在国别化教材二次开发的实践中。教材风格与学习风格的不适配，是进行二次开发的重要动因。吴思娜、陈宣的调查表明，匈牙利本土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与在中国的汉语学习者存在明显差异。开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场依存、场独立等认知特点，提供多样化的练习形式^[4]。类似地，吴文君基于埃及学生的需求分析发现，初级水平学习者对情景对话和角色扮演类练习需求较高，应建议减少机械性重复练习，增加交际性任务^[5]。

（二）开发对象：覆盖多元国别与多种教材类型

现有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研究覆盖广泛的国别范围，包括欧洲的匈牙利、德国，亚洲的印尼、日本、韩国、泰国，澳洲的澳大利亚，非洲的埃及、喀麦隆等国家。研究对象既包括通用型教材如《HSK标准教程》，也包括国别化专门教材如《匈牙利汉语课本》、《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中国概览》（斯瓦希里语版）等。

相关研究方面，朱海若以德国海因里希海涅大学汉语学习者对象，采用增删内容、建立联系、循序渐进、归纳概括等方法对《HSK标准教程》进行二次开发。^[6]袁婷围绕《HSK标准教程》韩国本土化改编成果，从教材结构、编排体例、课文内容及练习设计等维度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总结了其改编本在实现本土化过程中的具体策略与教学效果，并据此提出了针对通用汉语教材在韩国进行本土化二次开发的相关建议。^[7]唐雯则对印尼地区小学汉语课所使用的新加坡出版教材《欢乐伙伴·3B》进行分析，采用删减、补充、改写、调整及归纳概括等方式，从语音、汉字、词汇、语法、课文、练习六个方面提出二次开发建议。^[8]

（三）开发维度：从内容调整到文化融合

国别化教材二次开发的维度既涵盖拼音、词汇、语法等基础要素，又融入了当地历史、民俗、生活场景和社会热点，旨在使学习者产生文化认同感。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要素的调整，

如陈宣基于学习风格，对《匈牙利汉语课本》在语音、词汇、语法、课文、练习五个方面进行二次开发^[9]。

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融合维度日益受到重视。李浩对《体验汉语》（泰语版）系列教材的研究指出，文化融合有助于减少学习者的文化疏离感，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10]史恪凡对法国汉语教材《你说呢》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指出该教材通过引入中国文化元素、探讨中法文化异同，增强了学习者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度。^[11]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阿联酋开发的《手拉手》、《你真棒》、《跨越丝路》系列教材，在话题内容上成功融入了椰枣、沙漠等本土文化元素，人物形象设计也贴合当地学习者的认知与审美特征。这些兼顾中外文化、贴近本土文化内容的二次开发举措，增加文化教学的厚度，有效提升了教材的适切性与接受度，获得了广泛好评。

二、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的发展趋势

（一）从单向传播中国文化转向双向交流互鉴

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的内容重心，经历了从语言要素调整向文化融合深化，并从单向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转向双向交流互鉴的演变过程。

语言教学本身就蕴含着文化教学的内容，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早期研究主要关注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语言要素的本土化处理，而近年来则更多着眼于学习者所在国的生活内容、场景、话题等文化融合维度。据研究者分析，巴西国别化教材《精英汉语》中涉及巴西人和事的话题占比为13.3%，而英国汉语教材《进步》中英国话题仅占5%，前者因更高比例的本土文化内容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使其产生心理认同。^[12]再如面向北美大学生而开发的《中文听说读写》教材，采用“双向文化对比”设计，打破单一中国视角，在家庭观念、节日习俗、礼仪文化等方面系统对比中美文化差异，通过场景模拟让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

上述研究揭示了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中文化融合的必要性，及保持汉语语言文化与学习者所在国语言文化在内容上合适比例的重要性。换言之，教材内容应根据汉语学习者的民族文化、地域差异、语言背景或个性差异等进行合理安排与设计，使之更有趣、更亲近、更有效、更实用。这种开发思路既关注中国文化，也兼顾学习者所在国文化，强调文化对比与融合，拓宽了中文融入当地的广度、深度和宽度，实现了从“单向传播中国文化”向“双向交流互鉴”的转变。这一转变契合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培养学习者用汉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目标，也彰显了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使命。

（二）从静态教材到动态生成数字化教学资源

在国别化教学实践中，中文教材二次开发已不再局限于基于现有教材的教学资源建设，而是开始探索在缺乏适用教材的情况下，从零构建适切的教学资源。这种无教材依托的开发实践，意味着教材二次开发已从“如何使用教材”转变为“资源开发能力”。郑若曦基于日本汉语教材开发的经验指出，教材的本土化还

可以从教材的外围入手,开发适配各种教情、学情的多元化教学资源。^[13]

在当今数字化资源应用渐趋常态化的情况下,宋继华等指出要以需求为驱动,开发大量无须申请版权的多元化数字化教学资源,建立统一的数字化资源技术标准或规范,拓展共建共享的中文教育新生态。^[14]这种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教材二次开发的动因是教学资源的缺乏,且在AI赋能时代,数字化资源正以混合式教学、AI语言伙伴等形态突破时空限制,提高资源应用效能。为丰富中文教学资源及手段,喀麦隆在这方面开展了具体探索,组织研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对教材《你好,喀麦隆》进行微课录制工作,创生具有发展性的中文学习资源,高效完成教学活动。^[15]

(三) 从语言文化输出到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

2019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主旨报告中首次提出“中文+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模式,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携手出海的创新型培养模式正式启动。随着该模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项目,近年来为促进区域发展、助力教育升级、增进互联互通提供了新动能。^[16]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共建国家对“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亟需大批“通中文、精技术、懂文化”的复合型中文人才。在实践型教材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如何结合“中文+技能”模式,开发“中文+旅游”、“中文+纺织”、“中文+建筑”等职业导向教材,使其适应本土学生的语言能力与学习特点,培养学生工作场景中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中文教育从“语言传播”向“价值创造”的本土化转型是当务之急。

现阶段国别化“中文+职业技能”教材多为配合中资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职业技术学院建设而定制开发,主要集中在坦桑

尼亚、肯尼亚、塞舌尔等非洲国家以及柬埔寨、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国内职业院校是主要的研发力量。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于2023年开发了“新丝路中文+职业技能”系列教材,旨在培育既懂中文又具备专业素质的本地人才。这些教材在课程实施中加强了技能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增强了教学的实际效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研究与实践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与清晰的发展趋势,正从被动应对教材适配性问题,转向主动构建更具适切性、生成性与价值导向的教学资源体系。在开发动因上,学习者需求与教材适配性的双重驱动,促使开发策略在“从零编写”与“本土化改编”之间寻求可行路径;在开发对象上,研究与实践已覆盖多元国别与多种教材类型,积累了较为广泛的经验;在开发维度上,从传播中国文化到贴近本土文化,进而迈向深层文化融合。在发展趋势上,则体现为从单一的语言文化输出转向双向交流互鉴,从静态教材走向动态生成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并结合“中文+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发职业导向教材,整体推动中文教育从“语言传播”向“价值创造”转型升级。

这些特点与趋势是伴随着中文教育全球布局而产生的。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赋能与“中文+”模式的持续推进,国别中文教材二次开发将在更广泛的区域、更细分的领域,继续承载语言教学与文明对话的双重使命。与此同时,开发实践也将从经验探索走向理论建构,逐步形成更具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为构建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国际中文教育新生态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俞红珍.教材的“二次开发”:涵义与本质[J].课程.教材.教法,2005,(12):9-13.
- [2] 鲍蕊.喀麦隆孔子学院本土化模式个案研究[J].国际中文教育研究,2023,(2).
- [3] 周小兵,陈楠.“一版多本”与海外教材的本土化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3,27(2):268-277.
- [4] 吴思娜,陈宣.基于不同学习风格的教材二次开发——以匈牙利罗兰大学汉语学习者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7,15(01):32-38.
- [5] 吴文君.基于学习者学习需求的初级汉语口语教材二次开发研究[D].安徽大学,2021.
- [6] 朱海若.基于学习者学习需求的教材二次开发[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
- [7] 袁婷.汉语教材《HSK标准教程》的韩国本土化改编研究[D].湖南大学,2021.
- [8] 唐雯.基于学情分析的对外汉语教材二次开发研究[D].浙江科技学院,2021.
- [9] 陈宣.基于不同学习风格的教材二次开发[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 [10] 李浩.《体验汉语》(泰语版)系列教材本土化因素分析[D].西南大学,2021.
- [11] 史格凡.法国本土化汉语教材《你说呢》文化因素调查研究[D].西安外国语大学,2023.
- [12] 郑文婷.初级汉语教材《精英汉语》的适用性研究[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22.
- [13] 郑若曦.日本对外日语教材的本土化路径研究——兼谈对国际中文教材建设的启示[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4,(01):51-61.
- [14] 宋继华,张曼,梁丽芬.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深层认知[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3(3):7-14+89.
- [15] 陈宏,刘慧佳,佳妮.喀麦隆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模式、特色及对策[J].语言文字应用,2025(1):48-59.
- [16] 李怡.近五年“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研究述评[J].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2024,09(04):102-110.